

杨宜音（2002）“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载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华侨协会总会出版，407-420

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

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¹

杨宜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100732

提 要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一般来说，祖籍地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是相互附着的，而当社会流动出现后，这种连带关系出现了分离或重构。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典型地展示了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这样的理论观照，本研究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了实地调查，试图揭示文化对华人的凝聚机制和功能。

本研究发现，马来西亚华人身处多元种族文化背景之中，其文化认同源自以下线索：（1）由祖籍地认同、亲属认同演变为对整个马来西亚华族、华人社会组织的认同。整合机制由先赋性群体变为具有华人整体种族文化特征的现代组织。（2）由祖籍地认同、亲属认同、方言认同发展演变成为华语语言认同，突显出华人群体的文化特征。（3）由习俗信仰认同演变成为对文化价值的认同。由于文化价值是包括一整套标志着文化特

殊性的观念系统，影响着人们对于生存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因此，这表达了作为文化种群的人们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最终守护。马来西亚华人经过国家认同改变后，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主要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并逐渐建构了独特的马华文化。

一、文化认同的概念分析

文化认同 (cultural identity) 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及内心的承诺 (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以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形成个体的内群体认同 (in-group identity)，是指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华人的文化认同选择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族群中的成员的身份特征主要是文化性的，而不是其他特性的。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 (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类属 (cultural categorization)、文化区辨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和文化定位 (cultural definition) 四个基本过程 (Tajfel, 1978, 1982, 1984; Turner, 1987; Hogg, 1990)。在个人层面上，它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 (social identity) 和自我认同 (self identity)，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因此，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成

为群体构成的一种类型——文化群体。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认同的需要。其一是通过寻找「我」与「我们」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其二是通过寻找「我们」与「他们」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前者使得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后者使得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一致性和同一性。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个体总是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Brewer, 1991, Breakwell & Lyons, 1996)。文化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是个体获得文化群体的我们感(sense of we-ness)的途径和过程。

从演进的角度看，文化认同通常源自亲缘与地缘连带的亲缘关系认同、祖籍地认同、方言认同、宗教信仰认同、生活习俗认同、文化价值认同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文化认同又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形成相互附着的关系 (Müller-Peters, 1998)。因此，一般来说，祖籍地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连带关系。换言之，它们之间是相互附着的。而当社会流动（特别是移民）出现之后，这种连带关系则出现了分离或重构。经过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复杂而多样。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条件下，某一种或某几种认同的功能大于另一种或另几种，构成了形态各异的个人身份认同。例如，相同祖籍地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国家认同，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认同；相同的文化认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祖籍地、使用不同的方言、成为不同国家的国民。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文化、民族、宗教、语言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它们不断地被建构与被解构。其中，原本附着在祖籍地、

语言、习俗、信仰、民族、国家等因素之上的文化认同，逐渐表现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动力性。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就典型地展示了文化认同的这种独立性和动力性。他们在远离祖籍地的异国他乡，面对周遭的人和自己，都必须回答「华人是指什么」这样的问题。华人是指他的祖籍、种族、皮肤及外貌特征、语言，还是指他的信仰、习俗、文化价值观？进而的问题是，中华文化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是否可以脱离祖籍、习俗、语言、信仰而被保持？什么是文化价值的核心内容？换言之，保持文化价值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文化价值的保持是可以选择的吗？系统研究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将通过海外华人的实践探讨这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问题。

在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和平移民史上，东南亚华人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由于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长久、人数最多，而且由于东南亚华人对自己文化属性的选择的高度自觉，而典型地保持了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又融于居地国家的社会文化之中。这一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选择、保持自身的文化属性，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是华人华侨的创造和奋斗的历史，也为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往有关东南亚社会研究往往比较关注东南亚社会发展的状况（例如，朱杰勤，1990；林云辉、张应龙，1991；巫乐华，1997），或是关注华人社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例如，李明欢，1995；郭梁，1998），并积累了较多的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资料（例如，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1991；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1995）。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人们关于东南亚华人经济

社会的认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较少触及一个社会、心理和文化因素共同构成的层面——文化认同的层面。这一欠缺致使海外华人在以中华文化作为其种群特征而在生存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实践成果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另一方面，对于全球化给海外华人带来的新的挑战——在对自己文化属性进行选择的时候，华人将作出怎样的决定这一问题没有在学术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所幸的是，致力于推动海外华人研究的王赓武先生（Wang Gungwu, 1991）在他的《中国与海外华人》（1991）一书中特别著有“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研究”一文，提出了文化认同概念对于华人的意义；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林水濠（1999）就文化对于华人的整合等功能进行过研究；林水濠等人合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1998）对于华人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林开忠（1999）的研究更是从族群属性、民族国家与华人文化之间关系的视角审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经的历史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这些研究都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问题意识，但是，仍然因其缺乏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使得这些观点和假设没有得到更加充分和深入的验证与分析。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下，我们成立了「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研究」课题，试图借以经验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焦点组访谈、个案深度访谈及分析、历史文献分析、实地观察等，揭示文化对华人的凝聚力，探讨其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并发展出有效的测量工具。

作为研究的第一步，我们首先选择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2000

年6月至7月)。在五个被调查城市中，我们采用焦点组访谈（focus group）和个人访谈法对一百多位华人进行了不同深度的访谈，整理出访谈录音近20万字；参观访问了华人的家庭、血缘性、地缘性和行业性会馆、寺庙、华人兴办的医院、华人私人博物馆、华文独立中学、华文图书馆、华人文化协会资料馆、华人为主的政党、华文报社、华人社会研究中心和州及全国性的华人社团；进行了一百多份有关文化认同的问卷试调查。此外，还观察了华人比较集中的住宅区、沿街的各类店铺、饭馆，华人生活环境中的其他种族文化现象，例如，清真寺（吉隆坡）、教堂（诗巫）、印度庙宇（檳城）、荟萃各种民族风味的小吃城（古晋）、早期殖民时期外国人的公墓（檳城）等等。我们的正式问卷调查在2001年2月进行，被调查的样本来自马来西亚中部、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的六所华文独立中学和六所国民型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及其家长，共计1200位青年人和成年人。测量工具为在我们试调查问卷基础上编制的用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海外华人文化认同量表」。通过调查，我们将进行马来西亚华人学生不同华文教育水平对其中华文化认同影响的比较、马来西亚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异、不同地区比较等方面的数据分析和研究。同时，我们也对华人家庭、华人居住社区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我们共计整理出57万字的访谈录音原始资料。

马来西亚华人身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背景之中。一方面要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族、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种族的文化特征，以此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生存和发展。本文通过初步调查研究资料，梳理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演变的基本线索，在此基础上，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概念进行

解析，考察文化认同的动力性和独立性，同时形成问卷调查和量表编制的内容框架。

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梳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发展的线索，需要对文化认同及其形态类别进行说明和定位。文化认同作为个体对于文化的归属和承诺，从发生的角度看，最初必然是附着于种族、语言、习俗、民族、地域等属性的认同之上。这是由于文化本身最初是附着在这些属性上面的，是无法从这些属性中分割出来的。文化，根据比较公认的定义，是指文化群体成员之间共同拥有的一整套社会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系统。它反映在文化群体中成员的日常生活、习俗、宗教、艺术、教育、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安排之中，体现了文化群体对文化价值的选择（杨宜音，1999）。个体随着出生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这种文化属性，成为皮肤之外的最为重要的类别特征。然而，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于个体来说，文化所寓含的意义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个体对此不仅面临着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如何参与和建构的问题。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历程来看，我们发现以下三个主要线索：

（一）由祖籍地认同、亲属认同发展演变成为华人群体社会、经济、政治利益认同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首先表现为和来自于对亲缘关系和祖籍地认同。这也被社会学称为「血缘」与「地缘」关系连带引发的认同。由于这些认同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中包含的“自己人”区分系统（杨宜音，1998，2001）相联系，它给华人带来的是互助的义务、信任以及亲情。而这些恰是身在海外作为异乡异客

的人最为需要的。据统计，马来西亚西马华人的地缘组织（包括会馆、同乡会等乡团）1890 年以前有 77 个；1891 年至 1941 年新增了 164 个。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与地缘组织的数量关系如下：

表 1 马来西亚华人乡团组织数量

时期	华人人口	乡团组织数量	人口与乡团比例
1890 以前	391,418	77	5083: 1
1941	2418,615	241	5331: 1
1991	5260,000	769	6840: 1

资料来源：根据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刘崇汉“独立后华人乡团组织”、钟临杰“西马华人人人口变迁”、饶尚东“东马华人人人口变迁”（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整理。

这些乡团组织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功能为华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成为华人归属的社会群体。对于早期华人移民来说，大多数是只身来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乡团组织甚至成为高于家庭的归属群体（李明欢，1995）。在这个时期，华人对于文化的归属是对乡团所代表的区域文化的归属。

当血缘、宗乡关系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帮助的时候，华人各会馆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联合，同时各个行业的组织也逐渐形成。由血缘、地缘和业缘连带整合起来的华人社会出现了新的面貌，展现出更大的力量。在这个自然的整合进程中，突发的历史事件对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继而侵占马来亚。华人因此被动员起来，关注中国的命运、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这时，「中国人」和「华

人」的概念超越了「客家人」、「福建人」、「广府人」、「潮州人」、「海南人」等概念，成为华人新的身份认定。「中华文化」的地位也开始上升和超越地域文化的地位。此外，身处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得不寻求自己更有代表性的种族特性，以便归属于一个更加有力的群体。与马来人、印度人等民族相比，「客家人」、「福建人」、「广府人」、「潮州人」、「海南人」等更具有「华人」的族群相似性。通过社会比较，华人有理由形成更加有效的族群区别，以适应多元种族的社会生活。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在 1991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联合会，形成了完整的整合华人的全国性组织。伴随着华人的认同从过去的一族、一村、一镇、一帮的祖籍地认同，转变为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来自各个方言群体和祖籍地的华人对整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华人社会组织的认同也开始形成。在马来西亚 5762 个华人社团中，除了亲缘与地缘社团的乡团联合会以及目前居住区域的社团（例如各市州的社团），还有很大数目的商业、教育等业缘群体（例如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全国华校教师联合总会、全国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等）。这些社团在代表华人各方面利益、促进与其他民族沟通、处理本领域内的事务等方面已经变得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刘崇汉，1998）。华人政党的出现使华人社会在政治上有了自己利益的代表（何启良，1998）。

从这条线索上看，马来西亚华人经历了从归属传统的先赋性（ascribed）群体到归属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的获得性（achieved）组织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认同更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它表达了华人对于「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所作出的选择，建构了一个身

份认同的结构体系。即：在国家政治上认同马来西亚的前提下，形成华人的文化认同，它也包容了一部分人的各自的方言群认同。这样，华人整体的种族文化特征必然成为超越一宗一族的血缘纽带而凝聚华人的重要因素。

(二) 由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方言认同发展演变成为语言认同，表现为华校、华文报社的建立和发展

方言认同是附着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因为方言是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方言所形成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同时，也增强了方言区内的群体的一致性，从而形成内群体(in-group)认同。马来西亚华人的主要祖籍地——中国的福建省和广东省的沿海地区，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方言种类繁多，言语沟通困难。不同的方言标志着不同的祖籍地认同，所以，方言称为划分群落的指标。从「说哪里话」，辨识「哪里的人」，推知哪里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关系网络，甚至人格特质。不同的方言群所形成的人际区隔，成为祖籍地的代称。因此，当「华人」概念欲超越「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的时候，选择大众沟通媒介的语言问题也就被凸现出来。而中文文字基本相同，在不同中存在着相同，为语言的沟通提供了基础。这样，语言认同的需求与语言认同的条件同时存在，并且经过多年的历史积淀，使得来自不同方言区域的人在使用相同汉字的基础上，终于采用了普通话作为「华语」进行言语沟通。华校的建立以至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形成、华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也培养和保证了使用华语的基本人群。

语言认同始终作为重要的因素影响着华人的文化认同。语言所蕴含和传递的文化价值更是成为区分不同文化认同程度的核心内容。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在交往中习惯以接受什么语言教育为其文化认同程度（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判别标准。受华文教育的人与受英文或马来文教育的人形成的文化差别，反过来也说明了语言认同在文化认同中的突出作用。

表 2 马来西亚华人教育背景分类

	所受教育	受教育的时段
华文 教育背景	华文教育	小学、中学接受华文教育
	华文、英文教育	小学接受华文教育，中学接受英文教育
	华文、马来文教育	小学接受华文教育，中学接受马来文教育
非华文 教育背景	英文教育	小学、中学接受英文教育
	马来文教育	小学、中学接受马来文教育

资料来源：何国忠（1998）“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1998）《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正是由于看到了不同语言教育的背景对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坚持华文教育极其重视，其倾注的心力和财力之大之多，恐怕为全世界华人社会中仅见。学校、庙宇、会馆、社团、报社都在关心华文独立中学的成长和发展。这样，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便成为华人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成为凝聚华人心力的核心。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完整，规模较大，有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在华人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林水濠，1998；郑良树，1998）。

六十所华文独立中学尽管只吸纳了 10%左右的华人子弟，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文化认同的意义的确是很大的。在语言认同的基础上，那些只能或必须使用母语表达的文化才可能被体会，被传达。在语言认同的基础上，海外的华人才与中华文化无可质疑地连接起来和彰显出来。它们把华人群体的文化特征最明确地突显出来，成为除去皮肤相貌之外的华人最重要的族群特征。由此可见，语言是文化认同一种渠道、一种标志，也是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支柱。

（三）由宗教认同、习俗认同发展演变成为信仰认同、价值观认同，表现为华人对中华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的保持以及价值观念的坚守和发扬

由于中华文化中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特殊的功能，华人的宗教认同也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宗教认同的特点有所不同。这不仅表现为华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中包含了华人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个人观，而且表现为信仰与生活习俗、文化价值之间大量和深入的相互蕴含、干预和渗透。例如，华人的庙宇宗祠往往也是华人最初的聚集场所，从而成为宗乡组织的发端。一些姓氏公会、地方会馆以及学校往往就在庙宇宗祠的基础上扩建形成。由于在庙宇宗祠进行的信仰崇拜活动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和亚文化传递功能，华人的宗教信仰认同与祖籍地认同、亲缘关系认同、方言认同相互强化，更加突出了它作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构成作用。

宗教信仰回答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几大世界宗教，还是民间信仰，无一不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他们的价值选择。宗教信仰的精神实质融入

生活之中，便形成了价值体系的依据。而其中的文化价值更是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

文化价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至少包括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化、人生、个人成就、个人理想、社会规范、社会公平等等一整套标志着文化特殊性的观念系统（杨中芳 1994，杨宜音，1999）。这些价值是华人作为文化种群对于什么是重要的和值得的东西的选择，也是这一文化种群的特征，它影响着这一种群中的人们对于生存目的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正是文化认同所表达的作为文化种群的人们对自己精神家园的最终守护。

价值观是个体的选择倾向，也是个体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社会心理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根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它成为划分群体的依据之一。

当文化认同成为文化价值的认同的时候。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就将被独立出来，它可以不依赖语言、祖籍地、亲缘关系，而成为构成文化的内核。正是因此，文化认同才可能逐渐脱离先赋的一些特性，被人们选择和认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上确实可以看到那些不会说华文却保持文化习俗的「岬岬」和「娘惹」，可以看到那些不尊奉民间信仰而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却依然说华文、保持文化习俗的人们，可以看到更愿意以英文为媒介语言的年轻一代，他们也许不再坚守文化习俗和信仰，也许很少参加宗庙乡团组织的活动，却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上依然不放弃孝道、人情、面子、勤俭、报答、秩序、中庸、和睦、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这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

化认同的存在形态、条件和它的动力性特征。反过来，文化价值又对各种社会组织、语言和习俗信仰起着凸显其价值意义的功能，它赋予归属承诺某种文化形态的人们以选择的根据和意义。这种选择可能是被动的、由特定历史条件限制的（例如，「岌岌」现象），也可能是主动的、由个体意愿决定的（例如，信奉基督教、以非华文为媒介语言等）。无论怎样，文化价值选择形成的认同已经不同于生而与俱、伴随一生而且融入在血液中的先赋性的地域文化认同。

文化价值认同的另一个特性在于它的建构性。对于文化价值的自觉选择，必然使社会组织成员影响有意识、有明确宗旨、有热情地推动组织的发展，必然使文化群体中的成员和其中的各种组织在能够对保持和发扬这些文化价值起重大作用的事项上倾其心力。马来西亚华人在自己的实践中认定华文教育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同时，他们还将另外四项——社团、庙宇、报社、政党与华文学校教育并称为华人文化价值认同的五大支柱（李业霖，2000）。

文化价值的建构不仅体现了文化群体成员的自觉选择，还体现为文化群体成员对文化价值的能动创新。马来西亚华人组织开始注重对「马华文化」的探讨和建设。他们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例如，华人文化协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可以看出「文化」已经不仅以延续舞狮、花灯、茶艺等习俗为标志，不仅以传播一些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的思想观点为内容，而是以探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保持和生长的中华文化的定位、发展作为必不可少的任务。

三、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演变的意义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对海外华人的意义有两个，其一，以中华文化为首要属性选择和建构自己的「我们」概念，而不是以国家、民族、地域、方言、宗教选择和建构自己的「我们」概念；其二，由于以文化作为建构“我们”的基本属性，因此，「我」与「我们」之间也要形成新的关系。「我」与原有的地缘、血缘性的“我们”之间几乎同质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新的“我们”概念是超越原有地缘血缘性的我们概念的。新的「我」概念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意愿，也就是说，我选择了这个文化属性作为我的文化归属，这是我的文化上的我们。这种选择不是原有的地缘或血缘文化认同那种「生而与俱」（费孝通，1985）的先赋性认同，而是在生活社会文化历史的进程中的独立的个体进行的选择性认同。

从社会学关于群体形成等理论的角度看，文化认同表现为对某种文化身份的选择、获得与保持的结果，它不仅影响个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将成为群体划分与凝聚的重要因素。文化身份最初作为一种先赋性身份被包含在初级群体身份当中，是与生俱来的，与种族特征并存的(Parsons, 1951)。随着社会流动的出现，先赋性身份中所包含的一些因素逐渐被分离出来，使得个体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而这些选择性必然导致个人特性的张扬，个别差异被扩大了，张显了，随之就形成了与先赋性群体（家庭、村落、乡镇）相对应的获得性群体（同业群体、爱好群体、政党、价值观相同的群体、生活方式相同的群体、宗教信仰群体）。文化认同成为凝聚群体成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成为区

别不同群体的标志。这样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一样，都将是获得性的。

从理论上讲，当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种族能够共存于平等交流社会中的时候，人们将能够依据个人的意愿对于不同文化属性进行选择 and 建构，而不是服从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先赋性文化身份。选择性认同与先赋性认同的区别在于它所包含的自主性和建构性。

因此我们认为，对于马来西亚华人来说，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特性与程度必须从以下方面进行测量：（1）从祖籍地认同、亲缘认同到华人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2）从方言认同到华文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3）从宗教信仰、习俗认同到中华文化价值观认同这一维度上处于什么位置。这三个维度构成华人文化认同的操作性构念。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又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与当地文化共生的文化价值，从而发展出具有当地特征的文化认同，例如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文化认同。从个体文化认同来看，就是「我是华人」和「我是马来西亚华人」这一认同结果。

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特征是：开放和创建性的，而不是封闭和保守的；具有核心特质的，而不是被完全同化和放弃的；兼容其他文化特质的，多元的，而不是排他的。

四、结语

马来西亚华人在几百年的不懈努力下，经过国家认同上的改变过程之后，形成了以文化认同为主要族群凝聚力的社会整合机制，并且逐渐建构了独特的在马来文化为主要

背景的多元文化中立足的马华文化。表现在个体文化认同上，则是「马来西亚华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人的创造，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最终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马来西亚华人中演变为对马华文化的认同。这个过程也是不断与其他类型的文化比较、区别、融合，不断为本文化定位、更新、发展的过程。可以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案例不仅对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共生和发展提供了经验。

文献来源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年）

郭 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华侨华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何国宏，〈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李业霖，本课题组访谈录音，2000年7月。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1999）。

- 林水濠,《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总、马来西亚大学联合出版,1999年)。
- 林水濠,〈独立前的华文教育〉,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 郑良树,〈独立后的华文教育〉,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 林云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 刘崇汉,独立前华人乡团组织,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 刘崇汉,独立后华人乡团组织,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 饶尚东,〈东马华人人口变迁〉,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1998年)。
- 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杨宜音,〈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1998年),页82-93。
-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1999年),页38-52。
- 杨宜音,〈自己人: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载杨中芳主编《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台北:远流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
- 杨中芳,〈中国人真是集体主义的吗?——试论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台北: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4年)。
- 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钟临杰, <西马华人人口变迁>, 载林水濠、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1998 年), 页 197-203。

Breakwell, G. M. & Lyons, E. (eds.) (1996). *Changing European identit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

Brewer, M. B. (1991).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7, 475-482.

Hogg, M. A. (1990).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Müller-Peters, A. (1998). The significance of national pride and national identity to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A Europe-wide comparis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 701-719.

Parsons, T., Shils, E., Tolman, E., Allport, G., Kluckhohn, C., Murray, H., Sears, R., Sheldon, R. & Stouffer, N.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Harper, 1951) .

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Tajfel, H.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Tajfel, H. *The social dimension: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84).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 Academic Press, 1991), pp198-221.

ⁱ 本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改革试点课题“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研究”中的一部分。该课题负责人为杨宜音，课题组成员为陈午晴、陈婴婴、王镭、赵克斌、刘影翔。本文是在课题组共同进行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此感谢课题组成员的合作和马来西亚华人大会堂的热情支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周玉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邱立本教授对本文提出的批评建议，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康莹仪教授为本研究提供的部分参考文献。